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 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

◎ 张纯 著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 (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 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

◎ 张纯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 / 张纯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5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 / 步平, 沈强, 邵铭煌主编)

ISBN 978-7-5126-3506-7

I. ①抗…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儿童保育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D69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194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X24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49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 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3506-7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沈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邵铭煌（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

执行主编 荣维木 罗存康 唐立馨

编委会成员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荣维木 罗存康
 李蓉 梁光玉 赵广宁 唐立馨 李鑫 赵晓丽

总 序

步 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 70 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

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

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 13 亿人口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 20 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 10 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摘要

本书是关于抗战时期著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藉，惨不忍睹。一些儿童或被掳走，或被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取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

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

在8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占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

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变化、经济拮据、国共之间摩擦、管理不善、儿童升学等原因，致使保育院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辗转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省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巨大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慈幼院、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

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 12 个省市的 60 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绪 论

一、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研究情结

笔者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人读硕士期间。当时笔者对中国近代儿童教育颇感兴趣。清末,随着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教育上,传统的儿童观、教育观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03年秋,湖北幼稚园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涉足学前教育领域。1905年,清朝政府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对中国整个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使中国的教育进入“一个新旧教育嬗替”的时期,各种教育思潮与实践不断涌现。这些教育思潮与实践大多是借鉴当时西方教育思想而不断进行“中国化”的尝试。在儿童教育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诸如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著名儿童教育家。这些有益的教育探索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似乎戛然而止。为了弄明白抗战期间中国儿童教育的研究状况,笔者翻阅了战时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献及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特别的词汇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为了弄清楚这个组织及其事业的真相,笔者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但令人失望的是,关于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材料很少,而且大多语焉不详,这更加引发了笔者对于该组织的研究兴趣,于是决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在撰写论文期间,笔者查阅了当时的报纸、期刊,并在导师指导下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查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原始档案。那些由保育会工作人员用毛笔记录下来的工作档案,成为研究战时儿童保育会弥足珍贵的材料。通过硕士论文的撰写,笔者基本厘清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情况,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基本问题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时至今日,再次以该组织作为论文选题,一方面是基于自己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长期关注,对该组织有着一种研究情结;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笔者一直没有看到对战时儿童保育会有足够深入的研究成果,这种状况颇令人沮丧。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因为它离我们现在还不算太遥远,容易获得资料并能找到一些当事人,更重要的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探索的儿童保教方

法和理论是一笔巨大的精神、物质财富，它对当今中国的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研究意义

其一，本研究具有丰富抗战研究的理论意义。解放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对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工作成效做了较为片面的评价。随着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进行的正面战场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后，学术界对抗战研究也日益深入与丰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即使是这样，战时儿童保育会也因其特殊的“身份”——既不隶属于教育部门也不归属社会救济部门管理，在抗战研究中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统计中没有其数据与记载，在当代抗战教育的研究中也难觅其踪影。而研究抗战难童救济问题的研究者们，主要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专事难民救济的机构——振济委员会^①所办理的儿童教养院为研究对象。虽说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文献归属上属于社会部，但因其不隶属于振济委员会，所以研究者们在研究社会救济时也常常忽略它。

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的8年中，保育、教养了3万多名儿童，不仅稳定了军心、民心，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建设家园储备了力量。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救济的理论研究，而且也丰富了抗战时期儿童教育的理论研究。诚如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蔼真在保育会8周年纪念上所说：

八年的时光并不太短。奋斗了八年的保育工作，有许多经验值得研究。我们希望教育界先进，正在从事教育事业的，以及对于教育工作社会工作有兴

^① 振济委员会于1938年4月27日成立于汉口，是在前赈务委员会、行政院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合并改组基础上成立的。振济委员会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府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因国民政府内政部1930年规定：各级赈务委员会的“赈”字一律用“振”字代替，以实现“振奋民族精神，救济受难同胞”之意。

趣的,应广泛地搜集各种资料,加以总结,加以研究,使这一个诞生在抗战烈火中的事业,能对新中国有所贡献。^①

遗憾的是,抗战结束后还没有来得及对保育会做出研究,内战就爆发了。新中国成立后,也因各种原因并未对保育会进行研究,一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零星纪念性的研究文字。或许,现在是该对保育会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

其二,研究该组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胡适在谈论中国慈幼问题时,曾引用过朋友的一句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②胡适所引用的这段话,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其对待儿童行为与观念有直接关系。中国慈幼思想的发展与儿童观念的变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慈幼思想就是儿童观的体现。抗战时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体现了近现代慈幼思想的发展,更是推动了近代慈幼事业的发展,引发了国家、政府对于儿童问题的关心。如果说抗战前的慈幼观念还只是停留在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儿童保育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政府应尽的职责。在当时国家极为困难的状况下,国民政府以救亡保种的理念承担起了对儿童的保育与教育职责。尽管彼时的中国才刚刚对“儿童”有所认识,人们还没有从“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传统观念中脱离出来,但是“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的观点得到了政府的认同。这一观点对于推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时儿童保育会就诞生在这种背景中,它的出现对于抗战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中国儿童保育与教养的发展、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其三,该研究对当前的儿童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在教育理论上,战时儿童保育会在8年保育儿童的工作中总结出一套集体儿童教养模式——机关家庭

^① 张蔼真:《在艰苦中奋斗的保育院工作》,1946年3月10日《大公报》(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周年纪念特刊)。

^② 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0页。

化、管理科学化、教育生活化、教育社会化。这套儿童教养模式对当今的教育理论界来说，仍然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在教育实践上，战时儿童保育会既有别于慈善组织，也有别于小学校，它是一种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为一体的儿童教养机构。笔者曾经访问过一位当年的保育生，她对当年在保育院所受到的教育倍加赞扬，当她得知笔者是从事学前教育的老师后，她这样说：

你们可以创办像保育院一样的幼儿园和学校来培养身心健康的、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自强不息的儿童。要教育孩子自立、自强，孩子能自己做的让他自己做，不要太娇惯孩子。另外，在观念上要教育孩子不要瞧不起穷人，不要将父母的富裕看成自己的，用父母的财富来炫耀自己。所以说，创办一些像保育院的学校来发扬这种教育精神，是有必要的。^①

目前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迅猛，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城市大量农民工的出现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新生阶层。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打拼，因种种原因他们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由是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 5800 万的留守儿童，其中 14 周岁以下儿童有 4000 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 5 年以上。^② 父母成为留守儿童最熟悉的“陌生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留守儿童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实践的机关家庭化的儿童保教措施，对当前留守儿童教育应该有所启发。

此外，“保育会”“保育生”曾经是一个令人蒙羞的名称，因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领导者们大多是国民党高官的太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组织受到“冷遇”，这些保育生还被看成国民党的“特务”受到批斗。笔者曾经访问过一个已经去世的保育生的儿子。他说直到 1978 年平反以后他爸爸才敢和其他保育生联系。他对十几个保育生当年到家里来作客的情景仍然记忆深刻：

他们在我家里谈了一夜。十几个人每人讲每人的遭遇，忆苦思甜。我断

① “陆慧英访谈录”，2010 年 8 月 23 日于南京。

② 来自新华网：《中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频现，学者称勿停留在最底线》，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10/10/c_122134768.htm

断续续听了一点，那时我上初三，还不太懂。只记得房间里全是烟味，很多人在掉眼泪。第二天我起床了，他们还在谈……那天晚上，他们在我家谈到的很多人都死了，自杀的自杀了，被迫害致死的、打死的，太多了。^①

还有更令人扼腕的保育生遭遇，保育生李洪芳没有活过“文革”，他的儿子李林平后来说道：

我父亲只活了49岁，是战时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1942年参加远征军（新一军新38师辎重营）在蓝姆迦受训，在国军服役5年。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共军服役5年。“文革”中去世。“文革”“清队”运动他写了几十份的交代材料也没交代清楚其历史。^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作为保育总会直属第五保育院院长的曹克勋1993年在给直五院李伊默老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当时不是党员，在五院的地下党，又没有组织，互不相关，所以各人所谈情况，大有出入。直到‘文革’后，有了正常联系，也知道了很多背景，才把情况搞得比较清楚。保育会的历史，更有许多难解之处，我在京与一些当事人谈起，也各有争执。”^③曾经的当事人对保育会也有解不开的谜团，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还原该组织的全貌，给战时儿童保育会一个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尊重，而且也是对曾因保育会而蒙冤甚至蒙难的保育会老师及保育生们的纪念。经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教养的3万多名难童，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这8年的保育生涯，为他们奠定了人生成长与发展的基础，成为他们一生不能忘却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也正逐渐离开人世，在他们离开人世前能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这段远去的岁月，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也是一件极有历史研究意义的事情。

① “保育生何以纯之子何力行访谈录”，2010年8月23日于南京。

② 该段文字来自2013年3月12日，笔者与李林平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QQ群中的聊天记录。

③ 《曹克勋院长给李伊默老师的一封信》，《保育生通讯》（内部刊物）1995年第2期。